



学术顾问：艾四林

坚守“严格的铁的纪律”

张洪钰

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明确规定，所有盟员必须“承认共产主义”“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秘密”等。1848年1月，恩格斯在《宪章运动（支持全民请愿书群众大会）》中转述一名代表关于纪律的言论：“我们也加强我们的‘国防’：心中的大无畏精神，自己队伍中的纪律，行动中的一致！”这名代表把纪律比喻为一种国防形式，认为纪律起的是国防所发挥的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作用，恩格斯表示非常赞同。1851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纪律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除了严格的铁的纪律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严格的党内纪律是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保证。1859年4月，恩格斯发表《波河与莱茵河》一文，揭露了大国沙文主义是与意大利和德国人民的真正利益不相容的。但德国工人运动中却出现了“不同声音”，拉萨尔擅自以党的名义给维也纳通讯社供稿，发表了与恩格斯截然不同的主张，严重扰乱了德国工人运动。针对这种严重缺乏组织纪律的言行，马克思严厉斥责道“思想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并给恩格斯写信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纪律对于无产阶级政

党的重要性，与当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形势密不可分。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一直面临严峻挑战，既包括各种错误思潮造成的思想混乱，也包括组织上的宗派林立。第一国际时期，巴枯宁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应是自治的，反对任何服从和约束，无视国际总委员会的政治权威，还在混入国际后大搞阴谋分裂活动。如果对其听之任之，“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在无产阶级政党外部，生存环境日趋险恶，敌人异常强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无疑需要高度的集中和统一。恩格斯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群人航行在汪洋大海上，“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而“绝对服从”的要求无疑意味着严格的纪律。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党内纪律是政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只有全体党员严守纪律、严格履行党章各项要求，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步调一致，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组织并取得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靠马克思主义

理论武装起来的党，也是靠铁的纪律铸造起来的党。从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从制定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到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越来越强，对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小到强大并最终成为执政党，一大法宝就是有严明的纪律，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纪律建设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突出亮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解决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真正使学习党纪的过程成为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自觉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假如这个平原被敌人炮兵火力扫射，假如你们快渴死了，假如你们的伙伴在你们身旁纷纷倒下，假如你们突然在烟尘滚滚中感到脚下的土地由于敌人骑兵的强大攻击而震动，情况又会怎样呢？”

这段文字，出自1861年恩格斯所作的《布莱顿和温伯尔登》一文。恩格斯指出，一支“零零散散”的年轻部队不具备对敌战斗的素质要求，一旦在战场上遇到各种挑战，“是很容易不稳定的”。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一切呢？

恩格斯给出了答案：“靠纪律，只有靠纪律。”他引用英国上校麦克默多的演说，认为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纪律是组织成员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践行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这种纪律不只是纠正组织内的不良行为，更是一种由外在约束内化为“成了习惯”的自觉自愿的服从。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

贯彻坚强的党性

李自强



学术顾问：艾四林

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尔·海因岑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性质问题。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文指出：“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具有党派性。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派性，要求站在政治立场、宣传内容等方面符合党的精神，遵循党的意志，不能脱离和违背党的纲领。恩格斯指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很多都跟报刊工作有关。他们不仅为报刊撰稿，还自己办报。1848年6月，《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仅4个月，马克思恩格斯便亲自创办了《新莱茵报》。《新莱茵报》的办报宗旨既体现《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也符合当时无产阶级和人民

的利益。1848年，法国巴黎工人举行六月起义。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但《新莱茵报》一直和工人队伍站在一起。恩格斯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高高举起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新莱茵报》后来被列宁誉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才能正确宣传和贯彻党的精神。1849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工人联合会机关报拒绝宣传同盟的纲领，马克思对此提出批评，建议“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它应监督使机关报真正代表联合会的利益，并根据我们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达举行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报必须遵守党的原则，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应服从执行委员会；党报的业务和人员均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等。

为了保持正确的办报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决定在国外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散布报纸“不能打着旗帜前进”的论调，引起党内成员的思想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给予了严肃批评，强调党的报纸“必须和党站在同一观点的立场上，踏实地宣传党的观点”。恩格斯强调：“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

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

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企图制造党内分裂，恩格斯立即致信该党领导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住三个阵地：苏黎世的印刷所和出版社，《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新时代》编辑部。”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严格要求和帮助，《社会民主党人报》后来成为全欧洲最进步的报纸。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把报刊看作共产党人从事革命运动的“极其值得掌握住的堡垒”。列宁将报刊党性的内涵上升到组织意志层面。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列宁还从多个层面论述报刊贯彻党组织意志的实践方法：写作者要意识到所从事的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要参加到各党组织中去，报刊应适应变化中的党的中心工作的需要，等等。

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报刊党性的思想。党的一大通过决议，明确任何出版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要想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首先就要“贯彻坚强的党性”，强调

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连，呼吸相通，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循着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闻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党性原则的认识，促进党的新闻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发展及媒体格局、舆论环境的变化，对党性原则的内涵作了新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闻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要牢牢掌握正确政治方向，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